

著名语言学家 谈治学经验

奚博先 编



 商务印书馆

著名语言学家谈 治学经验

奚博先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200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名语言学家谈治学经验/奚博先编. —北京:商务
印书馆, 2008

ISBN 978 - 7 - 100 - 05702 - 8

I. 著… II. 奚… III. 语言学—治学方法—文集
IV. H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74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ÙMÍNG YǔYÁN XUÉJIǎ TÁN ZhìXué JīNGYÀN

著名语言学家谈治学经验

奚博先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702 - 8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1/4

定价: 19.00 元

目 录

前言	奚博先(1)
我的治学经验	王力讲述 奚博先整理(9)
我作为一个语言学工作者所经过的坎坷历程	岑麒祥(23)
学习·工作·体会	吕叔湘讲述 奚博先整理(39)
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经历	陆宗达讲述 王宁整理(53)
根据实际需要找科研题目	周有光讲述 奚博先整理(64)
周有光先生治学经验访谈录	周有光主谈 奚博先访问(71)
治学方面的两点体会	肖 璋(87)
知从实处来	吴宗济(92)
漫谈我的治学经验	葛信益(103)
困学反思	徐世荣(112)
良师指点 勤奋实践	马学良(123)
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	季羨林(137)
勤学苦练多实践	周殿福(145)
一边儿干革命,一边儿搞研究	郑林曦(148)
学习文字学的点滴体会	高景成(162)
治学·创新	陈士林(171)
“文改迷”的自述	刘泽先(183)
张志公先生传略	李一娟(195)

2 著名语言学家谈治学经验

回忆张志公先生谈治学·····	奚博先(214)
我的学习生活和体会·····	党凤德(222)
现代语音学的方向·····	林焘主谈 焦立为访问(238)
张寿康先生传略·····	李一娟(250)
我的自学经验·····	胡明扬(266)
附录:征集治学经验的通知 ·····	(290)

前 言

编辑这个集子的意图由来已久。1982年4月,北京市语言学会请当时82岁高龄的王力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作了治学经验的报告。到吕叔湘先生80岁的时候,北京市语言学会又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请他谈治学经验,并在会上请当时已经78岁的周有光先生也谈谈治学经验。事后这些讲话我都整理了录音。王力先生的,我在整理成文的时候,平实地加了个《我的治学经验》这样的题目。到整理吕先生、周先生的讲话录音的时候,我觉得不能一概都单调地名之以“我的治学经验”,于是略加变化,拟了个题目以便老先生们审阅。几位老先生审阅的时候,对我不揣冒昧地加的题目未作更改。

每次听完老专家谈治学经验以后,我和一些同行议论起来。老专家们对于能有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生涯,对后学有所启迪,觉得很有意思。中青年朋友觉得能够对治学有成的老先生的治学经历有所了解和借鉴,对自己今后的成长很有教益。长者所经历的艰苦曲折,可以指引方向并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奋进,他们的成功的经验可以汲取。我作为一个学会工作者,从请人到组织座

2 著名语言学家谈治学经验

谈会并最后整理录音成文,付出了相当多的劳动,在当今汹汹为利的潮流中以能无偿为语言学事业作了些贡献感到安慰,也很为做了这样有意义的事而高兴。

1984年的治学经验座谈会,主持会的是志公先生。他在主持的时候顺便也讲了讲自己的治学经验。我算了一笔账:连志公先生算上,一次座谈会也就只能有三个人谈。一个人是准备充分地谈,一个是无准备地谈,还有一个是顺便谈。何况,能主持会顺便谈谈的也就只能有一个人。这一个我还因为忙,没有整理录音。当时觉得志公先生是非正式地谈自己的治学经验,打算等将来他年逾古稀的时候正式谈治学经验,我再认真地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

接下来的1985年应该为陆宗达先生组织治学经验报告会。陆宗达先生也作了这个准备。随后是1986年再为周有光先生组织一个。但是当时有人觉得学会活动不应该总是一道菜,而且1984年已经请周有光先生谈过,再请会不会让人有重复的感觉?这样就间断了一个时期。其间不断听到会员希望继续组织这样的活动,认为不应该厚此薄彼。同时我又想:语言学界的老先生很多。王力先生谈治学经验的时候年纪已经80多岁,吕叔湘先生则是以谈治学经验的方式庆祝80岁大寿的。那个时候,张志公先生又给画了一个年逾古稀的杠杠,这样一来,北京市语言学会的高龄会员已经将近百位。一个一个地组织座谈会,岂不是旷日持久,事倍功半?

我们在间断了三年之后的1988年4月发了一个通知,以北京市语言学会名义号召年逾古稀的会员自愿写稿,笔谈治学经验。当时我计划在内部刊物《北京市语言学会通讯》上陆续发表。随

后,我们陆续收到了岑麒祥、肖璋、陈士林、马学良、吴宗济、徐世荣、郑林曦、高景成、刘泽先、党凤德、葛信益、周殿福等人为此专门撰写的稿子。陆宗达、季羨林、许国璋、周祖谟等人也主动以提供转载自己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介绍治学经验的文章应征。

满心想通过这样的办法把事情做得快一些,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有许多老先生自己很谦虚,不肯写。有些在再三敦请之下写了,但是因为一个内部通讯的容量有限,一下子不能全部发表。这样一来,我就不敢放手组织稿件。虽然《北京市语言学会通讯》先后发了几篇,但是时近 1989 年,种种原因使得这个《通讯》没有接着办下去。不过我们相信:这些稿子总归是有用的,因而我把它们另行存放了起来。

而作为此举的倡议人,也是北京市语言学会的缔造者的张志公、张寿康、胡明扬三位先生,我却一直没有写他们谈治学经验的文章。张寿康和胡明扬两位先生是因为当初还不到规定谈治学经验的“年逾古稀”。张志公先生虽然在 1989 年已经过了 70 岁,但是一来此后不久《北京市语言学会通讯》停刊;二来他一直觉得自己在 1984 年主持吕先生谈治学经验的座谈会上已经顺便讲了一些,后来又一直很忙,没有时间专门来谈这个问题;三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将来出的治学经验,可以自己谈,也可以学界同人来谈,还可以由学生来座谈,或者由记者、他人访谈。总之应该有多种形式,要搞得活泼一点。因为这样,我一直没有志公先生谈的治学经验。后来我还催过他几次。有一次他当着一位某报记者说:她(指记者)正在写。并且当面交待:“写好了你要寄给他(指笔者)一份。”此后我就一直等,不想直到志公先生作古,也一直没有音讯。

4 著名语言学家谈治学经验

寿康先生天不假年,过早作古,终年不足 70。明扬先生 70 大寿的时候,几个单位一起庆祝,请他作了一次治学经验的报告。后来责成人民大学他的学生整理录音,但是这个录音我却一直没有拿着。问明扬先生,他谦虚地说:他谈的不叫治学经验,是自学经验,不适合和王力先生他们的治学经验放到一起。我觉得,自学有成就是治学。后来,我就治学问题访问周有光先生,特地请周先生谈自学和治学的关系。周先生特别强调了自学。他认为,“做任何学问,都应当以自学为主。因为在学校的读书年限少,离校以后自学的时间很长。”这样我说服胡先生拿出自学经验的理由就更充分了一些。

二

这个集子里面收的是北京市语言学会会员里治学有成的专家,诸如王力、吕叔湘、陆宗达、周有光、季羨林等 20 多位所谈的治学经验。经过 20 余年的收集,现在编辑结集出版。内容涉及许多语言学家亲身经历的治学成长的过程。读了这个集子,可以了解他们的家世、师承、所接受的打基础的早期教育、走上语言学专业研究的道路、他们的指导思想、读书方法,以及怎样联系实际、确定课题、积累材料、处理各种矛盾,有的还有在前进道路上经历曲折、克服困难以及获得有关知识、方法的途径和在专业上取得的成就等等。总之这些著名学者的成功之路的各个环节都有所涉及,内容很为充实。

由于种种原因,把它们结集出版的愿望长期没有实现。首先是因为从 1982 年请王力先生作报告的时候开始算,至今已有 20

多年,我一直没有张志公、胡明扬、张寿康这三位先生的治学经验,使我始终犹豫着,不好着手编这个集子。因为他们是北京市语言学会的主要发起人、缔造者,在后来的 20 多年工作中也可以说是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大脑和脊梁。没有他们的治学经验,就好像缺了一大半。

但是手里总积压着这些老先生的来稿,退稿既心有不甘,结集又时机不到。天长日久,终于成了一种很大的精神压力。心里盘算:退休以后,一定要还这个愿。不料我刚退休没多久,就得了偏瘫,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是站着都不稳,行动当然就极为不便。还因为这 20 多年里,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搬过几次家,连把稿子找出来也成了很困难的事情。胡明扬先生一直很关心这件事情,多次询问。但是我直到今年过了春节,才在家人的帮助下费了很大的劲把老先生们的存稿找了出来。

考虑到各人的治学经验会有所不同,这 20 多年里又有了许多会员年逾古稀而且学有所成,应该有机会谈谈他们的治学经验。于是在 2005 年初,又约了几位这些年一直对学会工作热心,且已年逾古稀并在某些方面成绩斐然的先生撰写治学经验。后来这些先生中有几位寄来了稿件应征,但是和前面的存稿放到一起,许多人总觉得此举有些考虑欠周。后来一些先生出主意:干脆画一个年龄杠杠,省得摆不平衡。大家的意见是,王力、吕叔湘两位先生谈治学经验的时候,都已经是 80 高龄的老人,那么别人也就应该在 80 岁(包括冥寿)以上。当初规定 70 岁,现在水涨船高是应该的。不过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觉得对不住那些今年新应约的撰稿人,这里我表示诚挚的歉意。

我国语言文字学界迄今的唯一人瑞周有光先生,在 1984 年受

志公先生之请,谈治学经验的时候,他很谦虚,只谈了指导一个年轻人研究输入汉语拼音字母转换成汉字输出的过程,因此我就他所谈的主要内容起了个题目叫《边缘科学和拼音电脑》。他在这个讲话的最后和治学确定课题联系了一下。这次结集,为了适合本书的主旨,把题目改为《根据实际需要找科研题目》。周先生百岁之际,我不满足他那次所谈,特地在家人的接送陪护下,又专门拜访了他一次,和他做了比较长时间的谈话,回家写成了《周有光先生治学经验访谈录》。《张志公先生传略》里,具体谈治学的欠详,这回我也写了一篇回忆作了些补充,算作附录编在集子里。

我偏瘫的这些年,因为行动不便,不适合做学会工作而辞去学会的职务。因此结集的打算只能由我自己和一些学者、朋友联系,感谢这些学者、朋友给予了合作。特别是周有光先生,拨出时间接待了我作访谈,并不顾年高暑热,认真反复磋商审定文稿。我又多方打听,得知志公和寿康先生二位在世的时候已经由李一娟先生写下了有关文章。和李先生联系,李先生慨然应允,很快复印了寄给我。我又凭印象补充了志公先生谈治学的一些言谈,作为附录编在集子里。和胡先生电话约定:把他的自学经验提供结集。至此,北京市语言学会的三位主要缔造者的治学经验就都有了。

应该说明,这个集子不是一个一般的论文集,而是请诸位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谈治学。有的作者是泛泛地谈治学,没有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或者所谈离开了语言文字学方面;有的作者写作他的治学经验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论证某个学术问题,这些如果都编进集子,就会显得内容驳杂。因此为读者考虑,我们只好遗憾地删除。有些还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而没有先和作者一一商量,也一并说明。改得如有不当,谨向作者致歉并请批评指正。

现在很重视版权。所幸收在集子里的稿子差不多都是 20 年前经过学者本人撰稿寄给我,或者经作者本人同意,又或学者本人向我推荐转载的。有些稿子,是经由他人协助著名语言学家写成的,这里也都在目录里一一注明整理成文的作者姓名,以免万一发生纠葛。两篇访谈,曾经以奚博先或焦立为个人名义发表过,这里实事求是地在目录里反映出访问者和受访人。这次在成书的时候,其中健在的作者,都再次请他们签字。许多故人都已经作古,或者个别不便劳动的,只好请他们的家人代签。

三

特别应该让读者知道的是:本书的编成得到几位现在还健在的高龄学者的大力支持。年龄最高的周有光先生已经 100 岁,创我国有记载的语言文字学家长寿的最高纪录。而且在我今年 4 月访问他时候,他不仅接待了我的采访,在两个小时里长时间谈笑风生,还在我整理成访谈录以后不顾暑热审定全稿。他现在还写作不辍,不断有新著问世。吴宗济先生也已经比史有明文记载的语言学家都高寿了。就是其中年纪最小的胡明扬先生,今年也已经 80 高龄。在本书编辑出版的过程里,多承他们的关照和支持。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因为工作关系,本书中的著名语言学家多是故交。但是可惜,其中多数已经由故人而成为了古人。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里,其中多数已经和他们的家人设法取得了联系,但是有三四位的家人,因为搬家、拆迁或出国,即使是向原单位、原居住地派出所打听也联系不上。希望他们在见到本书的时候,主动和本人联系,以便

奉上样书和稿酬。

这个集子能够编成出版,我的这一心愿能够了却,多亏明扬先生对此事一如既往的关心。不过近年来出版界颇有一些让书籍编者为难的做法:出书要钱。我个人为编成这个集子出点力,花少量的钱不能报销,都还可以做到。因为我向来认为:国家给我工资,除了生活,就可以用来作些贡献;还因为从我从事学会工作开始,就已经决心为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出一些力。正因为如此,我不顾好心人的主动提醒,虽有所牺牲也心甘情愿。但是要大量投资出这个集子,我就不可能做到。“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所幸出版界并非都这么短视。这里要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使我们这些老先生的治学经验得以面世,感谢周洪波同志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本书责编先是李青梅同志,她也为此付出了辛劳,后来因为另有任务,责编又换了金欣欣同志。金欣欣同志为本书的最后出版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劳动。另外,张华杰同志和李鑫同志也通读过书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涉及外语的稿件,我没有把握,得到了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的帮助,谨在此表示感谢!

奚博先

2005.12.3

我的治学经验*

王力讲述 奚博先整理

近几年来,要我写自传、谈治学经验的不少,我一向不愿意写,不愿意讲。因为我的学术成就不大,我的治学经验未必值得借鉴。可是作为北京市语言学会的会员,会议要求我和同志们交流治学经验,我只好勉强来讲讲,向同志们请教。

我认为,所谓治学经验,主要是修养问题。所以今天我就主要来讲讲研究语言学应有的修养。

一、方法论

我常常对我的研究生说:科学研究并不神秘,第一是要有时间,第二是要有科学头脑。有时间才能充分占有材料,有科学头脑才能对所占有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我在学术上成就不大,就是因为我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这两点。

* 这是王力先生对北京市语言学会首届年会的全体代表所作的专题报告,奚博先根据录音整理。经王力先生本人审阅。

解放后,我学习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懂得了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充分占有材料之后,要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在关系。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说明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并根据它的发展情形去观察这个现象现在变成了什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我五十岁以后的科学研究帮助很大。

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指导

我在我的《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上说:“中国语法学者应该有两种修养:第一是中国语史学;第二是普通语言学。”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汉语研究,就能开辟许多新的园地。有人说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汉语研究工作,其实并不是什么开创性,只是普通语言学原理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

普通语言学里讲到很多很重要的道理。例如“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一个原理就很重要,我一生受用不尽。我从先秦古韵脂部中分出一个微部,主要根据是语音的系统性。要是从《诗经》用韵来看,好像独立不出来。因为微部字和脂部字合韵的相当多。但是我们得承认合韵。段玉裁在《答江晋三论韵》上说:“谓之合而其分乃愈明,有权而经乃不废。”

不承认合韵,很多韵脚就混成一团。段玉裁从真部分出文部来,文部跟真部就有合韵的,怎么又分出来了呢?主要是看系统,要看它们在系统中能不能分。

从前,我在我的《中国音韵学》里批判了戴震,说他唯心主义。后来我想:戴震是对的。他的话的大意是:按照系统来说,应该分

的就分,不能因为有一两个合韵就不敢分;按照系统不能分的,就不分。戴震提出的原理,从系统来看是对的。作为一个原理,批判它是不应该的。他的阴阳入三分,也是根据“语言是一个系统”看出来的。他的古音韵研究得不够好,是因为他没有能按照他所提出来的观点去做。可见,系统性很重要。

段玉裁从真部分出文部来,但是没有阴声、入声和文部对转。入声摆到哪里去了呢?摆到脂部(第十五部)去了。章太炎从脂部入声中分出一个队部(黄侃叫做没部),这就是文部的入声。按照语言系统,阴阳入对应,还差一个阴声。我从脂部分出微部,使微、物、文三部成为阴、入、阳三声对转,这是从系统性看出来的。两年前,我看到日本藤堂明保写的《汉字语源研究》采用了我的微部说,他说这样就有了系统性了。其实微部独立也不是我独创的。章太炎在《文始》里把“虽椎雷”等字归入队部^①,我受他的启发,从系统性出发,分出了微部。当然单凭系统性,没有材料证明也不行。我是从南北朝诗人用韵的实例中发现这个情况的,因为在南北朝,脂、微还是分开的。

两年前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普通话的日母字读音不应该是高本汉说的那样,是什么[ʂ]的浊音。当然不单是高本汉这样认为。很早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日母是[ʂ]母的浊音。我认为现代普通话的日母字的声母应该是[ʈ]^②,而不是[ʐ]。这也是从语音的系统性考虑的结果。这当然要用几方面来证明,首先用语音实验证明。不必用机器,只凭听觉就行了。把“神”shén中的sh念浊

① 章氏后来在《国故论衡》里,认为队是去入韵。

② 王力注:最近我又认为不是[ʈ],而是[ɬ],见《中国语文》1983年1月号《再论日母的音值,兼论普通话声母表》。

音,就不能念出“人”字来。当然用机器实验就更好了。考虑系统性也是一种证明方法。大家知道,现代北京话已经没有全浊声母了,[p]系、[t]系、[k]系、[tɕ]系、[ts]都没有全浊声母,怎么在[tɕ]系中就会冒出一个全浊声母呢?从系统性来看,是不可能的。

再说,从语音发展看,浊上变去,古代浊音上声字会变成去声,但是次浊就不变。“柳”字的读音不会变为 liù,“忍”字的读音不会变为 rèn,“语”字的读音不会变为 yù。次浊上声不变去,这也是系统性的表现。因此,日母字不可能变为去声。如果日母是 sh 的浊音,为什么它的上声字不变为去声呢?

举出上面这些例子,意思是为了说明:“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原理我一生受用不尽。我用这个原理指导我的语言研究,相信是有成效的。

普通语言学还有这样一个原理:语言的历史发展也是系统的。从一个时代变到另一个时代,是一个新的系统代替一个旧的系统。它不是零零碎碎地变的。所以我们研究语言史决不能零敲碎打,而必须对整个语言系统进行全面的审查。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社会就没有语言。这也是一个普通语言学的原理。我们研究语言,就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我国古代的语言学家反对孤证。孤证之所以不可靠,是由于它缺乏社会性。

什么叫孤证?孤证就是缺乏社会性的偶尔出现过一次的例证。例如:某个字在一个时代只在一本书中的一篇文章里出现了某一种意义,于是就以此为根据,给这个字提出一个义项来,这样的根据就是孤证。近些年来我看一些字典、词典的样品,就发现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有一本字典中,“信”有一个义项是“旧社会